

品读经典
支英琦专栏

支英琦,生于乡村,长在城市,长期从事报纸新闻工作。曾出版专著《岩石与火焰》、《简单的生活》、《画与话》、《清塘荷韵》等。现供职于大众报业集团。

桃花源里仙境寻

隐逸,指隐居不仕、遁匿山林,是中国文人远离世俗的诗意栖居方式。

东晋著名文人也是著名隐士陶渊明所作《桃花源记》,曾用生花妙笔描摹了一处隐居胜地: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——出尘脱俗的桃源胜境,令人心驰神往,也自然成为后世画家倾心描绘的题材。

“明四家”之一的仇英,就是其中之一。他精心绘制的《桃源仙境图》,用工致的画笔和精妙的构图,再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桃源胜境。

让我们随着画面,自下而上,神游于仇英意象中的桃源。

这是一个远离尘嚣的澄静的山谷,一座古朴的木板桥,横于深深的沟壑上。板桥下,潺潺的流水声依稀可闻,桥上,正有童子捧瓯而过,桥头的坡地上茂树杂生,青草如茵。不远处的另一位童子,捧着食盒,恭立一侧,在他的前面,是白衣飘飘的三位仙居高人。看他们,一人抚琴吟哦,该是《高山流水》的曲调吧?直让另外两位仙人听得如痴如醉。一泓小溪,从幽幽

的山洞里流出,淙淙的水声,和着洞口白衣仙人的琴声,在四周缭绕。看看仙人雅集的四围,山石矗立,古松虬曲,青藤盘绕,山桃夭夭,一处超尘出世的仙境,跃然纸上。

往上看,洞顶水雾迷蒙,一条小路在山崖和松林间时隐时现,通往古树掩映的远处,那里有高高的楼阁和精巧的凉亭,在古松掩映中如同天上盛景。更远处,嵯峨的峰峦,在云海起伏,幽深高森,引人无限遐想。

这是一幅重彩青绿山水,构图上采用近、中、远三层景物分布,清旷开阔,呼应有致。山峰画法以石青为主,石绿辅之,设色浓丽明雅,皴染严谨细密。特别是山间厚云排叠,造成了云气迷蒙的幽远空间,展现出远离世俗,虚幻缥缈的人间仙境。

仇英,字实父,从小受家庭影响,以漆工为生,20岁前后开始作画,很快成为影响广远的画家,许多达官贵人和富豪商贾也慕名而来,自此,仇英每日交往应酬于文人墨客间,使他的画中植入了文人气息。这幅《桃源仙境图》作为仇英的代表作品,不论一草一木,一枝

看来,一个人该做什么、一生中能做多少,还真不是“人定胜天”的。



一叶,还是人物的动态和表情都描绘得细致入微、严谨工细,显示了仇英精深的人物和山水表现能力。

在“明四家”中,相比于文人出身的沈周、文徵明和唐寅,仇英的漆工出身,使他独具脱胎于民间画家的个性风格,既有文人画的笔墨情趣与审美精神,又有民间的质朴与浑厚基因。而贫苦的身世,也让仇英倍加珍惜挥毫泼墨的艺术人生,他夜以继日地绘画,以完成客人定件的画作,而且,他从不应付,每一幅都苦心经营。不料,长期的过度劳累,使他盛年凋落,55岁时就溘然长逝。

看来,一个人该做什么、一生中能做多少,还真不是“人定胜天”的。如果仇英能够沉潜下来,深入地补习一下文化的功课,同时,适当远离卖画应酬的辛苦,或许,他就不会在艺术的盛年过早地离去,他笔精墨妙的传世作品一定会有更深厚的境界。

不过,我们还是要感谢仇英,用他工致精巧的画笔为我们幻想了梦中的桃源。虽无法身临其境,也可以心驰神往,感受古代文人理想中的隐居之乐。

呼吸之间
刘亚伟专栏

刘亚伟,笔名亚子,北师大研究生学历,原籍曲阜,下过乡,当过兵,资深报人,现为自由作家,出版长篇小说、科普读物等十余种。

好声音坏声音

最近浙江卫视推出一档节目,叫“中国好声音”,好评如潮,我好久不看电视的人,也被吸引过去,看了一期之后,竟然让我把前几期也都翻出来一一看过。其中不乏世间难得的妙音,让人听之愉悦、感动、激奋,乃至和现场的人一起流泪。

好的声音和其他艺术品一样,是一种稀缺资源,能够装进唱片卖钱。我家就收藏了不少好声音,闲暇时泡一壶好茶,和老伴坐下来,静心享受。

其实,世上的好声音可谓多矣,清代文人张潮的《幽梦影》罗列众多:“春听鸟声,夏听蝉声,秋听虫声,冬听雪声;白昼听棋声,月下听箫声;山中听松声,水际听欸乃声,方不虑生此耳。”然世上所有事物都是相对而生,有好声音,就有不好的声音,有人称之为恶声。《孟子·万章下》就说:“伯夷目不视恶色,耳不听恶声。”何谓恶声?泼妇骂大街,磨盘压住狗耳朵,铁锹铲在硬地上,无止休的抱怨声,嘟囔声,大概都是。

人脑袋上的器官,口司说话,吃饭喝水,兼做呼吸、吐痰;鼻司呼

吸,兼做嗅觉;眼司视觉,兼管传情……都有多种功能,唯有耳朵,只司听觉一职,一天24小时都敞开着,而且对于外界的声音,耳朵不能选择,只能一股脑地全部接受。耳朵的这种特性,决定了好听的声音再多也不会嫌多,不好听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种也会引起厌恶。

科技进步在为人类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,也捎带来许多新的恶声,比如电锯锯木头割铁片,隔壁装修时的电钻声、建筑工地的轰鸣声、夜间疾驰车辆的呼啸声、公共汽车上旁若无人高声谈笑或大声打手机的,社区公园里用喇叭唱歌唱戏的等等,这种种新恶声,比那些老恶声更让人惟恐避之不及。清晨,小区楼下常常传来一阵阵不停歇的汽车喇叭声,不知又是哪家的车挡住了哪位车主的出路。若是平常也就罢了,偏偏周末清晨,辛苦劳碌了一周的人们,不易得的懒觉清梦就此打破,殊为憾也。

一位在中国西部一个小城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外国人,曾对街道上的汽车喇叭声作过描写:“遇到其他车辆,他们要摁喇叭。遇到行人,他

耳朵的这种特性,决定了好听的声音再多也不会嫌多,不好听的声音哪怕只有一种也会引起厌恶。

们要摁喇叭。无论什么时候,只要他们即将超车,或者将被其他车辆超过,他们都要摁喇叭。当前方没有行人穿越,只是驾驶员觉得也许有人要过马路时,他们要摁喇叭。”开始的时候他和同伴对此抱怨不已,时间一长,只好像当地人那样,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,“一阵汽车喇叭声如同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树,几乎毫无声息”。一次他的大学同学从美国来看望他,“城里的噪音令他惊愕不止,每一声喇叭,每一声吼叫,每一声高音喇叭脱口而出的通告,他都听到了……实际上,在整个城市里,只有克莱姆一个人听到了这些喇叭声……整整一个星期,全城所有的汽车喇叭声都倒进了他一个人的耳朵。”(《江城》彼得·海勒著)

前段时间,我陪一位远方的朋友去曲阜老家游览三孔,发现原来一直歇息在孔庙院中松柏树上的鸳鸯全都不见了,稍后我在孔林的偏僻一角看到了它们。是什么逼得鸳鸯搬家?大概是太多的游人、太多的喧嚣,尤其是每位导游身上挂着的电喇叭,边走边讲,此起彼伏,为了照顾自己的客人能听到自己的讲

解,他们都把电喇叭的音量开到最大,各不相让,声音纠缠在一起,变成了刺耳的噪音。也许导游们已然习惯麻木,但是游客的耳朵受着数只电喇叭声波的冲击,简直是受罪。无怪乎连鸳鸯们都都避而远之了。

那个写《幽梦影》的清人张潮看来是对恶声之害深有体会,所以才说:“若恶少斥辱,悍妻詈谗,真不若耳聋也。”噪音聒耳,使人意乱心烦,厌恶至极时,竟恨不得让耳朵聋了才好。故有人戏言,耳聋是福分。想想真是,在现实生活中,能使耳根清净,已成了一种不可多得清福。

《诗经·邶风·旄丘》曰:“叔兮伯兮,不闻如充耳。”这里的“充”是“塞”的意思,“充耳”指的是古之君子,冠的两侧耳朵位置垂下的两枚多用玉石制成的饰物,用来挡住耳朵,是谓“非礼勿闻”。古时那些修身养性、功力深厚的道者僧者,可以做到置若罔闻或充耳不闻。我辈凡夫俗子,想避其恶声,既无法远离,又不能学鸵鸟,把头钻进沙子,就只有努力追求陶铸的境界:“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,问君何能尔,心远地自偏。”

以文为戈
刘武专栏

刘武,导演兼制片人,曾任大学讲师、新闻记者,出版过《醉里看乾坤》、《生命的几分之几消耗在路上》等专著,参与编导100集大型纪录片《睦邻》、45集纪录片《兄弟》。

最后的手抄报

去印度的加尔各答之前,我去过好些国家的“唐人街”,但“塔坝”还是让我感觉有些异样。“塔坝”是加尔各答西北郊的中国城,建筑陈旧粗糙,街道狭窄,人也不多,到处散发着难闻的气味。

据记载,塔坝原先是一片沼泽地,早在18世纪就有一位年轻的华人天主教徒到这里定居。到1951年,这里的华人多达9万余人。后来由于各种原因,大多数华人陆续离开印度,到现在,当地只剩下千余人,其中绝大多数是广东梅县人的后裔。塔坝人经营的主要是印度人不愿干的皮革生意,鼎盛时期有200多家皮革厂,每天处理3万张牛皮,占印度全部皮革生产的五分之一。那些难闻的气味就出自那些皮革工厂。

令我惊奇的是塔坝华人办的中文《印度商报》,绝对是史上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手抄报。这份报纸从1967年开始由当地华人集资创办,长期手刻蜡纸抄写内文,用红、

黑油墨印刷出版,每天一期,从未中断过。发行范围除塔坝和加尔各答外,还远及孟买和德里等地区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该报的高峰时期,总发行量超过七百万份,塔坝的皮革商们也纷纷在上面投放广告。当时,这份报纸还有个竞争者《印度日报》,但现在《印度日报》已停刊多年。

我去了这家幸存的报社,它距塔坝的入口处不远,在塔坝厂商理事会的会馆中。会馆的房子是几间平房,老旧得不能再老,墙皮斑驳,窗棂腐朽,室内光线昏暗。正门的议事厅墙上悬挂着各届会长的照片,商报的办公室内简陋到极致,办公桌、椅子和油印设备都颇具历史感,让我感觉时空倒转,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。

时值酷暑,报社里只有几台老式电风扇,发出“卡拉卡拉”的金属摩擦声。我见到报社的总发行人陈其蕊先生,他个子不高,身材瘦削,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,颇像当年

由这份手抄报,我看到了当地华人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持续的热诚和挚爱。

老报馆的编辑。在这里他工作了大半生,现在他26岁的女儿也帮他做点事。多年来,他们一直坚持用手写的方式出报,每天出对开纸一至一张半,四到六版。主要版面包括国际要闻、本地新闻、中国大陆新闻、中国台湾新闻、小说连载和广告。

那时,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给报社赠送了一台电脑,他们才开始每天上网收集信息,加上少量的当地新闻和企业广告,一早汇集到陈其蕊先生那里,陈先生审定后,再开始编辑。以前当然是用手刻写,近几年才用上电脑打印,然后剪贴下来排版,最后在复印机上批量复印出来。如今,这份报纸每天发行只有二百来份,相当于一份社区内刊。

其实,我当时很想问这么一句:这份报纸还有必要办下去吗?但是,看着陈其蕊先生瘦弱的身躯,我硬不忍心开口问他。他平静而坚定地告诉我:我们一定要有一

份华文报纸,我会为它干到不能干的时候。

可能很多人不太能理解印度华人的心情,其实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着深深的依恋之心。塔坝原来还有一所中学,叫培梅中学,意为培养梅县的子弟,这是印度最后一所教授汉语课程的中学,鼎盛时期最多曾有1000多名学生,我去的时候还有几十名学生坚持上课。但如今已停止招生,成了一所空校,目前只供当地华人举办婚宴或为社团提供活动场所。

能够念中文书、读中文报纸、说中国话,对塔坝的华人来说,算得上一项奢望。由于皮革生产污染环境,塔坝的皮革厂纷纷关闭或转营餐饮,塔坝日渐衰落,80%以上的华人移民加拿大或其他国家,那份惨淡经营的《印度商报》以后是否还能办下去,明显是个问题。但是,由这份手抄报,我看到了当地华人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持续的热诚和挚爱。